

记者在内蒙古博物院边关岁月展厅见到了金灿灿的鹿角金步摇冠,面对眼前这件1600多年前的瑰宝,不禁为它精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折服得屏住了呼吸。

摇“叶”生姿金步摇



鹿角金步摇冠 (高18.2厘米 宽12厘米 重69.5克)。

鹿角金步摇冠由纯金制作,镶嵌宝石,造型像一只鹿角,由马面基座、鹿角花树、桃形摇叶等几部分组成。

鹿角金步摇冠1981年出土于达尔罕茂安联合旗(以下简称达茂旗)。那年10月的一天,达茂旗西河子公社社员修整打谷场时,在距地表半米深处发现了一组古代窖藏。文物工作人员闻讯赶到现场调查、发掘,窖藏出土5件精美金器:1件金龙饰、2件牛头鹿角金步摇冠、2件马头鹿角金步摇冠,总重量达531克,经专家鉴定均为北魏时期遗物。

牛头鹿角金步摇冠、马头鹿角金步摇冠造型独特、工艺精巧,别具匠心,均采用铸造、锤揲、镶嵌等工艺,代表了当时顶级的黄金细工工艺水平,是国宝级的艺术精品。这4件鹿角金步摇冠分别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关于鹿角金步摇冠的基座形制,研究者最初认为是“牛头”“马面”形动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属于鹿科动物,也就是俗称的“大角鹿”,是拓跋鲜卑的核心文化因素。而花树状步摇冠主要流行于西晋末、十六国前燕时期。前燕是慕容鲜卑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慕容鲜卑是历史上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和吐谷浑五个政权。

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均为历史上鲜卑部族的分支。说到慕容鲜卑,读过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的人,眼前会浮现出金庸先生笔下那个燕国王族后裔——风度翩翩、卓然不群、武功盖世、一生从未断复国之梦的慕容复,慕容复却真实存在于历史长河中。慕容鲜卑,与宇文、段部合称为东部鲜卑。慕容鲜卑在跟随鲜卑部族南迁西进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击败宇文部、段部,占领了辽东地区大部,成为四世纪雄踞中国北方的主要政治势力之一。

慕容鲜卑突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注重发展农业,安辑流民,不仅扩大了军粮、赋税及兵丁、差役来源,而且增强了政治基础、稳固了统治。政治上完善官僚体制,形成封建政治;用人上选贤任能,任用汉族士人,由此可见,慕容鲜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部族。

拓跋鲜卑于公元3世纪中叶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强盛起来,迁至土默川平原,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公元315年,拓跋力微的孙子拓跋猗卢被封

“代王”,建立“代”政权,定盛乐为北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为南都。公元338年,什翼健即代王位,并于公元341年在盛乐城南筑盛乐新城。

慕容鲜卑在辽西,拓跋鲜卑在阴山地区,两地相距较远。今天的达茂旗当时属于拓跋鲜卑境内,西河子出土的鹿角金步摇冠有慕容鲜卑的文化元素,究其原因,是两个部族高层联姻的结果。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部什翼健建国二年至二十五年(339年至362年)之间,与慕容部建立的前燕频繁联姻。鹿角金步摇冠可能是慕容皇后的嫁妆被带到了拓跋部境内。作为嫁妆,鹿角金步摇冠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匠心,将拓跋部的核心文化因素三鹿纹牌饰中的大角鹿形象,与慕容部传统的步摇进行了融合混铸。无独有偶,在辽西地区,前燕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附近的墓葬中,也发现了慕容部文化元素的花树状步摇冠和拓跋部三鹿纹牌饰同墓现象。

从鹿角金步摇冠上可以看出,鲜卑人在金银装饰制作上非常精细,他们不仅用锤揲技术制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还熟练地运用了錾刻、掐丝及镶嵌等工艺。文中鹿角金步摇冠上马的双眼、双耳及鹿角等部位就镶嵌有红、白宝石,边缘处还饰有鱼子纹,是当时制作技艺的典范。

从中国步摇饰件的发展史来看,步摇主要是汉族文化的产物。步摇在商周时期已见雏形,宫廷贵妇用金银、玉石等打造出一些造型简单的步摇,插在头上起固定发髻的作用。“步摇”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后来,步摇又被固定于冠上,遂称为“步摇冠”。汉代,步摇真正发展起来。不过,汉代的步摇是宫廷后妃的专属礼制首饰,民间女子没有资格佩戴。汉代以后,步摇才开始逐渐在民间流行,成为古代妇女争相佩戴的首饰之一。

鹿角金步摇冠造型独具特色,粗犷中不失精致,古朴中不失奢华,在充分体现鲜卑人高超的金银首饰加工制作水平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古老北方游牧部族的文化历史和民族特色,是我国北方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部族文化融合的最佳实物见证,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

(据《内蒙古日报》)

程十发画作 寓意“平安大吉”



画中的木棉花造型生动、色彩丰富,显得花团锦簇,其与威风凛凛的雄鸡,象征平安长寿的竹子、寓意高洁的兰草遥相呼应。

据介绍,此画为著名画家程十发所作,画家以“鸡”谐音“吉”,“竹”则寓意“竹报平安”。整幅作品画面内涵丰富,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据《侨乡科技报》)

赏石史款竹刻诗文臂搁



明清时期,文房用品的制作达到了鼎盛,各种文房用具一应俱全,臂搁更成为了文人必备的用具。臂搁,一般也称为腕枕,为旧时文人写字时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房用具。

该图臂搁手感光滑轻盈,颜色古朴泛红,竹纹清亮细腻。整片呈卷起的书页状,此种形制曾在古式的壁挂博古架和石

刻文房四宝上见过,但在臂搁中属异形,较少见。尤其是上下两头的曲线切割部位线条流畅圆润,相互对称的弧度居然不差分毫,再加之细细打磨后的截面不见一丝刀痕,此种精工手工艺着实让人惊叹。

众所周知,虽然竹刻(雕)艺术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但相比木雕和石雕,其难度是最高的,且刻字比刻画更见功力。此枚臂搁上镌刻有明清调阅阁体意的行草书诗一首:“莲开玉井华峰颠,一叶随风下碧烟。虽到人间化为石,九天珠露尚莹然。”虽年代久远,表面也有刻痕,但整体线条遒劲,牵带细腻,笔势自然,行气颇佳。落款是“石史”,为仿刻的缪篆白文扁章。

(据《联谊报》)



清代状元 行书七言联

张馨是清光绪年间的状元,他不仅是清代大儒翁同龢的弟子,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据介绍,这副行书七言联为张馨的传世书法,释文为“采药会须逢蓊子,杖藜时可过蕲端。”张馨的书法笔势开张,点画飞动,气势宏大,笔力千钧。

(据《侨乡科技报》)

集邮之路“痛并快乐着”

黄绍锵的集邮之路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他父亲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工作,常从办公室废纸篓里捡出信封,从上面剪下一些花花绿绿的邮票带回来。黄绍锵由此爱上了集邮。工作后,他常到东山龟岗路小邮票档口选购外国邮票。1981年,他移居美国爱荷华,收藏了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随后又把目光聚焦在清代、民国等早期邮票上。

黄绍锵夫妇搜集邮票的渠道包

括参加邮展、邮购和拍卖会等。邮展多在星期天举行,且举行地点离他家较远,要驱车几个小时才能到。夫妻俩常带上水和干粮,赶早启程。邮票虽小,价值却不菲。黄绍锵一家省吃俭用,但购买邮票时却常倾囊而出。黄绍锵说,为了集齐一套邮票,特别是大套票的普通邮票,常常需要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数十年来,陪着黄绍锵参加邮展的妻子张秀霞女士已被邮商们熟知。他们打趣地称她为“保镖”。

珍贵邮票回到故乡

光阴飞逝而过,黄绍锵收藏的邮品越来越多,其中一些难得一见的邮品还是在拍卖会上竞拍得来的。从一家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退休后,黄绍锵有更多精力整理和欣赏这些宝贝邮票。随着年岁增长,他渐渐有了一个想法,将这些邮票回馈给社会。

情牵桑梓的黄绍锵筹划将数十年收集的邮票捐赠给故乡。在选择捐赠地点时,黄绍锵优先选择了家乡广州的地方志馆。2019年1月,黄绍锵将首批1517件珍贵邮品捐赠给广州市地方志馆。截至2024年4月10日,黄绍锵共捐赠邮票6批合计3843枚,这批文化瑰宝成为了市地方志馆的“镇馆之宝”。

黄绍锵夫妇捐赠的邮品包括中国清代、民国时期的大多数邮票,其

(据《广州日报》)

娇艳牡丹瓷上开



牡丹纹是一种典型的汉族瓷器装饰纹样。自唐代以来,牡丹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被称为“富贵之花”,成为瓷器上的流行装饰。

元、明、清三代牡丹纹久盛不衰,多用作主纹,装饰在瓶、碗、盘、罐等器皿的主要部位。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上的牡丹纹更加丰富多彩,其中有折枝牡丹、缠枝牡丹等。表现技法上有刻花、印花、绘画等;形式方面包括有独枝、交枝、折枝、串枝、缠枝等;构图方式有适合式、对称式、均衡式等。

该瓶直口,削肩,圆腹,腹以下渐敛,圈足。器身呈橄榄状,颈部对称置贯耳,足边有两长方形孔可供穿带用。胎质洁白坚硬,内壁施白釉,釉面莹润,通体以珊瑚红釉为地,釉色鲜艳夺目,上绘数枝粉彩牡丹,三朵盛开的黄、白、粉三色牡丹在绿叶的衬托下娇艳无比。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款,外圈青花双线圈。

此瓶造型端庄,图案描绘精细,以珊瑚红釉为地衬托粉彩牡丹,色彩娇艳,为雍正时期珍贵的陈设用瓷。珊瑚红釉系将配好的釉料吹于白瓷上经低温烧成,釉色均匀,呈色红中微闪黄,近似天然珊瑚之色。粉彩是在素器上以“玻璃白”打底,再用彩料进行晕染作画,最后经炉火烘烤而成的一种釉上彩瓷器。粉彩瓷器的色调淡雅、柔和,具有温润之感。

作为一种器物,贯耳瓶的寓意丰富多样,在不同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中,寓意不同。既可以代表纳谏、丰收、和平,也可以象征多子、多福、多寿以及平安吉祥。

(据《联谊报》)

老邮票深藏家国情 美籍华人黄绍锵将收藏的珍贵邮票捐赠家乡

近日,2024年广州史志系统第三期培训班上了一名特殊的客人——市地方志馆邀请了美籍华人黄绍锵先生讲述“方寸之间的家国情怀——邮票和老明信片上的广州故事”,带给大家一场穿越时空的邮票文化盛宴。

黄绍锵先生集邮数十年,收藏了许多难得一见珍品,包括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中国第一枚错版邮票等。从2019年至今,他共向广州市地方志馆捐赠邮票6批合计3843枚,这些邮票成为广州市地方志馆的镇馆之宝。



黄绍锵先生捐赠的石印蟠龙邮票。

